文研讲坛(之十一)——作为方法的亚洲

主持人语

本专栏的题目来自半个世纪之前竹内好的一次讲演。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向这位独创的日本思想家致敬,更是因为他提出的课题今天远未完成。当欧美的历史被抽象成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模式时,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当"作为方法的欧美"不能被相对化时,亚洲只能是杂乱的田野材料。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以亚洲思想对抗和取代欧美的优秀思想遗产,而是在反对思想霸权的意义上建立多元共生的世界图景。在这样的世界图景里,不同的历史贡献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们不必相互模仿,却因各自的主体意识得以建立彼此间的关联。作为方法的亚洲,将与其他各个区域的"方法"一道,以多元的认识论重构人类的精神生活。

——孙歌

史料批判的思想射程

——上原专禄与他的世界史

孙 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上原专禄是一位在日本早已淡出公共视野的学界泰斗。他一生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以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同时代基本课题建立了深度关联,以一己之力不断打破学界常识对于学术、思想与现实关系的想象,确立了关于现实生活与历史关系的认知形态。上原早期在维也纳受到版本考证等史料批判训练,为他后来从事具有高度思想张力的世界史研究奠定了特定的认识论基础。沿着史料批判的思路,不仅有助于理解上原世界史的核心内涵,而且也促使我们反思通行世界史论述中那些被忽略的盲点。

关键词: 上原专禄;史料批判;世界史;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K 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2-0074-12

上原专禄(1899—1975)出生于明治末期,他的人生几乎与 20 世纪同时起步。20 世纪的日本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从闭关锁国的岛国迅速"崛起"为野心勃勃的军事国家,在日俄战争险胜之后,试图推进对朝鲜的吞并和对中国大陆的占领,并在深陷战争泥淖之后为摆脱困境铤而走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末期,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在人类史上成为美军核武器的最初"试验场"。1945 年战败之后,日本上了美国的战车,作为其在东亚的最大军事基地,间接地参与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作为战后形式上主权独立的代价,从 1952 年到 1972 年,冲绳作为美国托管地丧失了主权,并在其后成为美军制衡世界的重要军事立脚点。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上原作为历史学家度过了他的一生,并以自己的方式诚实地直面世界史中的日本。

收稿日期:2021-09-20

作者简介:孙歌,女,吉林长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

一、从史料批判的基点出发

1916 年,上原进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求学,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在历史学家三浦新七指导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

明治时期是日本在各个领域大量引入西欧制度形式、技术以及精神成果的时期,商业和经济是其中最受重视的部分。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是商学科与经济学科的重镇,它 1920 年升格为东京商科大学,1949 年开始更名为一桥大学。在上原求学时期,这里洋溢着宽松的学术氛围,学生可以自由地阅读思考;大正前期日本思想界的进步思潮,比如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献等等,也对上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有更广泛的求知欲,接触当时的宗教运动、白桦派人道主义等等,在广泛地涉猎了相互之间并无关联的众多思想潮流之后,上原感觉到了这些潮流之间的矛盾,意识到将相互间并不相容的价值进行结构性整理的必要性。这时,导师三浦新七给了他重要的指点。三浦说:"这就是历史。所谓历史,就是诸种价值的体系。在历史之中,各种价值各自拥有自己的位置。在整体上把握全部的体系,这就是学习历史。"①

三浦新七在 1902 年被文部省派遣,奉命前去英国和德国学习商学科知识。原本预定的留学期限是三年,但是他在游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时,遇到了德国经济史、文化史大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并被他的学问吸引,于是进入兰普雷希特主持的文化史及普遍史研究所,直到 1911 年才回国。他回国后在母校东京高商开设了商业史与经济史课程,在上原本科毕业进入"专业部"(即今天的研究生院)求学时,正好赶上三浦开始开设独创性的"文明史"讲座。

在三浦身边,上原不仅阅读了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著作,也研读了费希特哲学与阿达姆·缪勒的政治经济学,培养了严谨的读书习惯。由于家庭的宗教背景,他也钻研了日本佛教经典,通读了法华经、净土三部经、日莲和亲鸾的著述。

三浦决定送上原去欧洲留学。上原想去最好的学者那里学习,他询问三浦,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谁? 三浦回答说,当代没有伟大的历史学家,不过维也纳大学的多普斯很优秀。于是,1923 年,上原被三浦直接送到了多普斯门下。

德国中世经济史专家多普斯并不研究文化史,上原留学时,不得不与他在东京受到的文化史训练暂时保持距离。在两年的学习期间,多普斯对他进行了两种史料批判训练。一是研读德国中世纪一级史料,例如细读中世纪德国修道院的捐赠记录等原始资料;二是对研究文献进行史料批判,例如多普斯派给他一个任务,让他考察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否成立。为此,他必须每天去国立图书馆手抄本文献室通读二十七卷本的手写文献《富格尔时报》。富格尔家族是宗教改革前后欧洲最繁荣的家族之一,在经济上支撑了天主教体制。这个家族发展了德国式财会记账方式,留下了计算资本收益与损耗的第一手史料。上原后来出版了自己对富格尔家族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史料批判积累。

多年研究上原专禄的小岛洁,根据上原的回忆文章进行了谨慎的推论,得出一个重要的判断:上原在维也纳接受的严格训练,并不在于考证本身,而在于他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对既成权威的理性分析:"即使是已经享有盛名的学者,对他著述内容是否得当,也需要逐一确认。所谓读书,就是以这种对假说进行确证与批判为具体目的而展开的——上原受到了这样的教育。……(《富格尔时报》是)桑巴特

---

① 《上原专禄著作集》(以下简称《集》)卷 18,东京:评论社 1999 年版,第 19—20 页。转引自小岛洁《推荐涂鸦式论文(上):关于现代日本的学问意识》,网刊《MFE 多焦点扩张》创刊号,2021 年 8 月,第 34 页。由于笔者手头一手资料有限,关于上原早年求学时期的基本经历以及思想倾向,本文受益于小岛研究之处颇多,特此注明并致谢。

研究对象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史料,但是假如认为可以直接拿来用于检讨桑巴特的假说,那就太天真了。在边记笔记边细致阅读的过程中,上原意识到不能把史料中的记载直接作为事实接受。在此之前,‘首先要对《富格尔时报》本身的出现原因、其史料性质、它记载的各种报道的可靠性进行确实的认知。’(《上原专禄著作集》卷 17,276 页)”①这种沉潜的结果,使上原的学术着眼点从最初的怀疑权威论述准确性转向了原始史料本身,他对《富格尔时报》的史料批判,不再服务于对桑巴特假说和其他史料批判大家既定著述的质疑,因而成为独立的史料批判研究。最终,他用德文发表了论文《富格尔时报考》。

上原在求学时期形成的这种不轻信任何既定权威的思维习惯,配合他同样形成于这一时期的“彻底求证”的学风,不仅帮助他在学术生涯前半期完成了若干富有洞见的学术成果,例如对马克斯·韦伯关于德国经济理性形成时期的假说进行了修正、揭示多普斯的德国中世史研究认识论特征等等,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形成了大于他追求目标的学术眼光。这种学术眼光与一般意义上的“挑战权威”并不相同,它的核心是一种纯粹的求知欲。为了确认桑巴特的假说是否成立而开始的史料调查,却完成于对《富格尔时报》的文献学研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对既成权威的怀疑,对既定研究结论的求证,不仅使上原获得了学术上的问题意识和高超的论证能力,而且帮助他以同样的态度对欧洲的学术与文化进行了“批判”,即“确认对象的边界”。即使在早年作为学生留学时期,上原在接受学术训练时也并非是无条件的,他尽可能地让自己与欧洲学者一样,使用考证的方式深入研究对象,同时,他拒绝被研究对象同化,拒绝被欧洲学术同化。他的思想工具正是史料批判的视角和方法。多年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研究德国中世史、为什么以导师多普斯的研究为对象撰写论文的时候,这样写道:“我撇下万事不顾,把研究主题固定在‘德国中世纪’,并在很长时间内进行对相关史料的试读,既非对象本身拥有魅力,亦非认定了研究具有很大意义。即使这样的理由多少起了些作用,仍然还是要说,我之所以持续地执着于‘德国中世史料’,主要是因为三浦博士把我装进普通邮包海运给了多普斯教授,而他很偶然地是专攻‘德国中世’的历史学家而已。……比起多普斯教授的业绩本身,我更希望深入了解的是他这个人和学问的关系。同时,我希望探究使多普斯其人其学问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的欧洲社会与文化,追问什么是欧洲历史与历史学。所以我别无选择,我只能通过与多普斯探讨学问相同的方法,从体验出发去把握多普斯其人倾注热情持续研究的‘德国中世’。”②

出于偶然因素进入了德国中世经济史领域的上原,在这个领域里形成了他持续一生的工作方式——通过为研究对象在动态的历史脉络中“定位”,深入分析制约该对象也被该对象影响的各种关系。③ 这种对动态历史关系的把握方式,使上原从中世纪德国某一地区的具体问题开始,把目光逐渐扩展到欧洲,再扩展到世界史;但是由于他始终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为对象“定位”,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他在把研究对象“相对化”的同时,也避免了天马行空的观念性讨论。应该说,日后上原开始世界史建构时,“定位”的思维为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前景。

二、作为禁欲的读书与作为抵抗的读书

1926 年,上原结束留学生活回到日本。他在刚刚成立的富山县高冈高等商业学校工作到 1928 年,然后转到母校东京商科大学任教。在高冈高商,他接受了校方邀请,参与《富山卖药业史史料集》的编

① 小岛洁:《推荐涂鸦式论文(上):关于现代日本的学问意识》,网刊《MFE 多焦点扩张》创刊号,第 40 页。

② 《集》卷 3,东京:评论社 1989 年版,第 312 页。上原这里说的“试读”,是一个他特别强调的理念。其含义是:读书和思考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当学者提出学术假说时,他必须承认假说需要修改、发展,有些部分会被否定。

③ 上原在《德国中世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多普斯教授的问题意识》中借用多普斯的说法界定了“定位”的含义:“把一个事物的实际状态‘有机地且毫不牵强地组合进经济的整个过程之中。’”《集》卷 3,第 228 页。

撰工作。据上原的女儿弘江回忆,那段时间上原的家庭会话从早到晚都充斥着“富山卖药”。上原在这个共三编六集的史料集中实践了他在维也纳学到的古文献整理与阅读方法,他这样解释了工作内容:“先搜集散见于各处的有关富山卖药业的单个史料,把它们根据史料的史料学性质与内容进行分类,进而对各个史料的原本、副本、写本、草稿、刊本等的区别和不同版本间的差异进行核对,对于史料中未明确记载日期的进行时间上的推定,对于只留存了片段部分缺少全文的,尝试进行原本复旧,对某些史料(例如出纳账簿),也有必要把它提供的史料内容分解为各项,在此基础上推定记入的顺序,尝试重新组合。”①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从 1927 年一直持续到 1934 年,除了最初搜集资料动员了高冈高商的教员之外,其后的编撰工作几乎都由上原独自承担。

上原埋头于富山卖药史料的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升级的时期。这场最终卷入了全体国民的非正义战争,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 1931 年 9. 18 事变开始到 1941 年底,日本以中国东北地区为基点推行了从局部到整体的侵华战争;而从 1941 年 12 月 8 日偷袭珍珠港开始,日本把战火烧到了太平洋彼岸,也进一步向东南亚出兵,试图争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这时,战争的性质从侵略亚洲邻国转变为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

在这个历史至暗时刻,借助于官方意识形态导向,一些学养深厚的学者趁机推出自己的学说。被称为“京都学派四大天王”的高山、铃木、高坂、西谷这四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举办了连续性座谈会,以“世界史与日本”作为论题。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史”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这个系列座谈会被视为最有学理性的成果。

如果说明治维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让明治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感知到了世界,那么尽管经历了日俄战争并偶然取胜,那个时代的日本精英尚不足以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最真实的想象,仅仅是在东亚邻国获得霸权,用以对抗日益渗透的西方势力;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上层政治精英、尤其是部分知识精英产生了“世界以日本为中心”的幻觉。以太平洋战争为契机,日本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史”论述的高潮。

京都学派学者的三次座谈会,题目依次如下:1. 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2. 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3. 全民战争的哲学。虽然在题目上迎合了官方意识形态,但因此断定他们自觉充当军国主义政府的喉舌,也不免失之于简单粗暴。事实上,演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他们的追求,这三次座谈的学理性是相当突出的,有些论述的学理完成度很高。一个基本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在战后虽因支持过战争而一时被开除公职,但这几位学者在有生之年仍然继续推进战时的学理线索,并没有因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基本观点。②

对“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系列座谈以及参与者其后著述的全面分析并非本文的任务,在此仅限于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在这个系列座谈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意识中,欧洲与亚洲构成对抗性实体,而亚洲对抗欧洲的核心领导力量是日本;世界史论述保持了宏观性与抽象性,整体上看,所谓“世界”其实只是西欧加上日本而已。这几位学者虽然专攻有所不同,但在学术排斥日常经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国家视角的抽象性,一方面消解了民众生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另一方面,

① 上原专禄:《关于高冈高等商业学校编〈富山卖药业史史料集〉的编撰、出版》,转引自《集》卷 3,第 334 页。

②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高山岩男(哲学)、铃木成高(欧洲中世史)、高坂正显(哲学)、西谷启治(宗教哲学),他们在五十年代以后主要以杂志《心》为阵地,持续发表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区别、特别是关于日本民族主义等议题的座谈与论文。虽然这四个人之间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差别,但在总体倾向上看,他们大致可以被归类为日本人文主义教养派,以追求学理为己任,对现实的判断常常表现出保守主义特征。

则更容易天马行空地表达论述者的主观意愿。① 京都学派的座谈呈现了一种极为奇妙的状态:就学理而言,它与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显得十分“客观”;就论述而言,由于不处理个体的日常经验,反倒容易以抽象形态表达主导世界的“主体意志”。当主体意志以“国家”或“民族”的范畴体现的时候,它易于被意识形态利用是在所难免的。

四大天王的系列座谈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社会当时难以言表的社会氛围进行了“学理性表述”。岩波书店这个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出版社在 1942 年出版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暗示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特定时刻的特定思想感觉。中日战争带给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困惑与内疚,30 年代日本社会的虚无感与无力感,都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暂时消散了②。战后岩波书店再也没有与高山合作,《世界史的哲学》在 2001 年由其他出版社再版,反过来说明了这个特定历史时刻“世界史”论述具有的特定轮廓与特定功能。

上原在这个时期仍然埋头于德国中世史的史料考证和近代德国经济史著作问题意识的研究。除了翻译之外,他的《德意志中世史研究》(1942)、《德意志近代历史学研究》(1944)在美军轰炸和不定时的停电中相继出版,与战局的紧张形成了鲜明反差。当时出版物有一种不成文习惯,作者往往在导言中写上当时流行的套话:诸如“大东亚战争如火如荼的今天”“身处后方心系前线”等等,据上原弘江回忆,上原也曾经有一次勉强在自己的序言里写下这样的套话,但最后还是删掉了③。上原当时的态度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只有在结束之后才能对其进行全面判断,事件进行过程中的主观意志,不能直接作为“意义”加以肯定。④

这个时期,上原的文献阅读与研究具有“禁欲”与“抵抗”的二重性格。就前者而言,他埋头于德国中世史的原始史料与研究文献,并进而把讨论扩展到欧洲近代史学的认识论问题,因而不但不读与其无关的书籍,还因此牺牲音乐美术等业余爱好,而且刻意与日益紧张的时政保持距离;就后者而言,“通过与多普斯探讨学问相同的方法,从体验出发去把握多普斯其人倾注热情持续研究的‘德国中世’”,是他使自己把日本人心醉的欧洲相对化、以主体性自由意识打造世界史立场的必要程序。“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即使是作为沉默地抵抗与对欧洲的自卑感一体两面的对亚洲的歧视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军国主义动向,我的史料试读也不可偏废。于是,作为禁欲的读书就带有了‘作为抵抗的读书’的性格。”⑤

关于这个时期上原写作和翻译的大量著述,笔者没有相应的学识,不敢贸然妄评;我希望在有限的能力和篇幅之内,仅止于初步提示两个基本问题:一,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上原,在烦琐的版本考证中时刻关注着人的生存样式、人的生活欲望,坚持把学术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二,在研究德国经济史并致力于深入理解欧洲的同时,他也关注欧洲与欧洲之外的文化交往和影响,显示出不同于京都学派“世界史观”的世界史观念。

---

① 最能够代表这四位学者上述看法的,是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东京:岩波书店 1942 年版)。特别是其中“历史世界的结构”和“世界史的谱系与现代世界史”两章,充分呈现了四人座谈会中对欧洲近代内在矛盾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拒绝在日本领导下共同对抗欧美的不满。

② 竹内好晚年回忆说:“岩波茂雄(译注: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和实际经营者)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也开始说跟英美对着干是好事。那时候这种痛快的感觉非常强烈。”(竹内好:《我的回想》,《竹内好全集》第十三卷,第 256 页)

③ 上原弘江:《上原专禄著作集 3 卷后记》,第 326 页。按照她的说法,这种套话不符合父亲的“审美意识”。

④ 小岛洁的《推荐涂鸦式论文》对上原发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随感《世界史考察的新课题》(《统制经济》1942 年 3 月号)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上原接到编辑部稿约,要求他论证大东亚战争的世界史意义,他却把文章标题改写成“世界史考察”。针对当时受到喝彩的京都学派座谈会,上原提出:不能在没有对人类生活的历史本身和历史记述的历史缺少实证性研究的情况下,就在概念上提出“世界史的哲学”。

⑤ 《集》卷 3,第 313 页。

写于 1941 年的《卡尔·兰普雷希特与经济史研究》,简述了这位史学巨匠的学术历程。上原并不关心兰普雷希特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论战,他把关注点集中在《德意志史》写作之前和之后兰普雷希特对经济史视角的调整和发展。上原指出:早年兰普雷希特以统计学方式研究法国 11 世纪的经济生活时,就设定了记述农业领域里国民生活样式的课题意识;这种以“总体上的物的文化”为统一视角的理念,后来发展成为以社会心理为基点统合“物的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元论视角,这也正是兰普雷希特文化史的追求。上原分析说,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诸种事态,虽然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却具有共通的心理特征。追求一元论视角的兰普雷希特最后以“民族心理”为基点统一了经济、法律、政治生活与信仰、学术、艺术等理念性要素,试图以此涵盖民族生活的整个领域。但是,所有的生活形态真的都能够心理化、内面化吗? 从心理上把握经济生活,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德意志史》主卷中,关于经济生活的叙述也只限于对经济制度的外部观察。上原提示说,其实兰普雷希特比任何人都更强地意识到由此而生的视角的分裂、方法的破绽,《德意志史 补卷》第二卷以新的视角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兰普雷希特把“经济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心理紧张”作为时代区分的原理,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生活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经济思维和经济预期的增长、经济冲动和经济知性的增大这些不太被经济史重视的要素成为区分历史时代的契机。

上原关注《德意志史》的认识论问题,与他不满于西欧学界只关心兰普雷希特《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等经济史研究有关。经济史家围绕兰普雷希特史料考证的问题持续讨论,但是却遗忘了《德意志史》对经济意识的探讨。上原说:“经济说到底并不是‘物’的问题,它是关乎欲望如何被知觉、为使被知觉的欲望得到满足如何设定意志、为了实现意志什么样的知性在起作用等等‘心’的问题。这样的想法和观察,对我们不是具有无限的启发吗?”①

上原认为兰普雷希特最应该被超越的,是他关于经济意识超越民族个别性的观念。上原提出,经济史的一个中心课题,就是对经济意识的民族的、文化圈的地域特性进行揭示。这个视角他坚持了一生,正是这样的视角,不仅使他获得了把西欧相对化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后来的“地域世界”问题域,支撑了他的世界史构想。

1938 年,上原写了书评《小林太市郎著〈支那与法兰西美术工艺〉》。这是一部讨论 18 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所受中国美术影响的美术史专著,上原在其中读出了超过洛可可艺术论的“博大的世界史观察”。他赞赏该书在详实的史料与丰富的文献基础上勾勒出 17、18 世纪欧洲流行“支那趣味”的交通史、商业史背景,惊叹作者对各个具体事物的犀利观察和准确的知识;他更为赞赏的是,在只重视西欧文化东渐的时代里,小林的著作却难得地处理了东方文化西渐的问题。上原进一步追问道:什么是东方文化? 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视为同质的文明? 具体而言,冲击了西欧的古代和中世的东方文化,与感动了近世西欧的东方文化,性质不同,承担者也不同(上原虽未展开此论述,但显然他指的是在历史上先后影响了西欧的欧亚草原民族与东亚中国、日本文化)。小林关注的只是文化移动的方向,这使上原感到不足。他追问道:洛可可美术的形成受到中国美术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西欧艺术及文化在整体上受到何种程度的东方文化影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超越艺术领域把文化整体作为对象的时候,是否在考虑东方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北方文化的影响?

这里的“北方文化”,指的是日耳曼文化。上原一方面高度评价小林“文明西渐”的思路,另一方面试图打破这种东西方二元的想象,暗示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意识:以东方和西方进行对称区分的方法本身就是西方式的。他在书评结尾处写道:“遵从本书的提示,静思世界史的发展,我头脑中浮现出古典希腊神殿极为均衡对称的建筑,它象征了东西文化交涉的对位法关系。这种姿态可以视为著者性格的显现;如果像评论者这样考虑到北方日耳曼文化的要素、东方文化自身内含的多种异质文明,那

① 《集》卷 3,第 115 页。

么这种左右均衡的对位法式的世界图像将被取代,取代它的,也许可以想象成诸如不规则的水晶群般的对象吧!”①

1943年底,京都学派关于东西对抗的世界史论述尚未降温之时,上原为1938年的这篇书评补写了追记。他在结尾处引用了小林的说法:“看上去背道而驰的种种文化各有其长处,在一种文化的内部综合这些长处,是不是可能的? 至少不是不可能的吧。这么说,是因为吾人已经看到一些例证,这些长处不失掉各自的光彩,反倒因为对比而各自增加了光辉,从而在伟大的人格中得到了综合与统一。”②这个引用意味深长。晚年上原构想以13世纪历史人物作为横切面书写世界史,灵感很可能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形成。③

与当时盛行的“世界史哲学”相对,埋头于史料考证的上原在认识论上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向:以“不规则的水晶群”为意象,他深切关注所谓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却不为这种粗糙的对立观念所回收,他以更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思维,面对了纵横交错的世界历史。在二十年的史料考证生涯中,上原准备好了他特有的世界史认识论,当日本战败,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退潮之际,上原开始了另一种世界史叙事。

三、日本国民的世界史

1952年,上原主导了一个七人写作小组,花费了三年时间,经过字斟句酌的讨论,为日本的高中写作了一本世界史课本。这本倾注了上原大量精力的教科书在1956年到1958年之间流通了三年,被很多高中采用;但是其后因为无法通过文部省的审查,被迫停用。1960年,写作小组进行了修改补充,由岩波书店重新出版,并更名为《日本国民的世界史》。

这是一本在思路上不同以往的著作。上原在亲自执笔的序言中交代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意识:

第一,人类史与世界史是两个不同的史学领域,处理的是不同的历史对象。已有的世界史书写基本上从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写起,以民族、社会、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它们的发展轨迹为轴线讨论历史事件,这其实是人类史的视野。世界史并不是诸多国家历史的简单相加,它是世界各个区域开始发生接触、互动并向着一体化方向运动的历史,它的起点要晚于人类史。

第二,本书分为四部,前二部分别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它们的基本讨论单位不是国别,而是文明圈,即共享某种文明的国家群。后二部仍然以文明圈为单位,但讨论世界以西方近代的扩张形成“一体化”的过程和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形成的“现代”世界新格局,与前二部相对,文明圈的自足性被打破。国别单位在书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并不是论述的前提和归属④。

第三,本书在历史分期上不同于已有的通行惯例。历史分期的逻辑与叙述者的理念直接相关,并非是可以随便套用的“技术”。当时通行的两种历史分期方式,一种是欧洲史学通行的古代、中世、近代的分期方式,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以古代为理想创造近代的方法意识,内含着人道主义产生以来的欧洲传统;另一种是把经济法则视为历史法则的分期方法,它批判把经济现象视为自然现象、把经济法则视为自然法则的看法,认为社会与经济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思想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代

① 《集》卷3,第184页。

② 《集》卷3,第187页。

③ 上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着手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讨论世界史开端的庞大写作计划,这个计划从日本的日莲开始,涉及13世纪前后从东亚到西欧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参见笔者《世界史中的亚洲》(《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第21—48页),在此从略。

④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章节目录如下:第一部 东洋文明的形成及其发展;第一编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以其为中心的东亚史的发展;第二编 印度文明的形成及其发展;第三编 西亚文明的形成及其发展;第二部 西洋文明的形成及其发展;第三部 西洋的近代化与世界;第四部 现代的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版)。

表,把历史区分为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讨论对象不同,本书不采用这两种分期方法,它只是在欧洲部分沿用了古代、中世、近代的称谓,亚洲三个文明圈的时代发展特征则以文明圈的形成为标志区分此前与此后的历史时代。整部书的历史分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亚洲与欧洲文明圈平行发展,彼此没有交集和冲突;第二阶段,西欧近代的对外扩张导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形成,这是一个通过暴力过程使西欧以外的广大世界从属于欧洲的帝国主义时代;第三阶段,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曾经附属于欧洲的广大地区主体性地进入了世界史,欧洲文明从霸主地位退回到世界文明之一的位置;美苏势力增大,构成立体的世界格局。

第四,与叠加国别史论述的世界史写作不同,以文明圈为基本单位的视角在组织史料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区域性互动的要素,而不是单一国别的独立发展过程。即使在各大文明圈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的时期,文明圈的形成、文明圈内部的流动性也是论述的重点。例如东亚文明圈部分,隋唐之前统一帝国的确立与瓦解、北方民族的南下与汉民族的南迁等以动态的方式加以呈现,而以隋唐时代中央集权国家正式确立为分水岭,把历史分为两大不同的时代。唐代完备了律令制,影响了周围的国家,促成了以唐为中心的律令国家群,在东亚形成了政治与文化的文明圈。以此为分水岭,唐之前尚未形成东亚文明圈的时代与之后的时代具有不同性格;但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亡,东亚文明圈发生变动,中国内部的王朝更迭与外部世界特别是高丽王朝、日本的关系不断产生各种连锁效应,东亚的一体性与这种变动的效应紧密相连。而鸦片战争的历史,在本书中被置于第三部《西洋的近代化与世界》中《十九世纪的亚洲》一节中叙述,亚洲的近代与欧洲近代的关系在这里构成基本的叙述逻辑。

第五,本书对于"现代"有特别的关注。现代不仅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它也是世界史中一个具有不同以往性质的新时代。只有在现代,不同的文明圈都以能动的方式影响历史,所有文明圈都共同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即世界和平的问题。近代及近代之前,这种共通性并不存在。由于这种共通性,才有可能开始形成一体性的世界史。

第六,日本国民在每天经营的实际生活中面对大量现实问题,不可能不加思考就动手解决。必须思考的是,这些问题为何会发生,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含义。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日本国内单独积累起来的,它们形成的原因与条件往往关涉到东亚各民族乃至西方各民族走过的道路。为此,必须要把视野从现代回溯到过去的时代,从日本扩大到世界。这就是日本人需要学习世界史的根本原因,它不只是知识性的对象,更与当代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上原在该书还是高中世界史课本的阶段,就强调了一个他终生坚持的看法: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世界史,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样本。关于时代区分的假说,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问题意识进行不同的设定。上原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思考理路,历史学通行的各种规范,其实都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以"史料批判"的眼光对待历史学的假说本身,追问其背后的逻辑,才能准确判断其有效边界,避免将其绝对化。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出版之后,上原不顾成员们继续跟着他研读讨论的希求,解散了写作组。他相继辞去了国民文化会议的会长等学术团体的要职,并从一桥大学提前退休。在日本社会迅速进入大众社会、消费文化开始盛行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上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余生心无旁骛地献给世界史研究。他说:世界史"必须一个人去做,但一个人无法完成世界史"。① 直到 1975 年离世为止,上原进一步推进、展开了他在集体写作中提出的上述设想,更为个性化地完善了"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世界史"的构想。

1968 年,上原在 NHK 广播讲座中指出一个很少被思考的问题:人类是否真的实际存在。他说,人们常常使用的"人类"这个词,其实只是生物学意义上区别于猴子和类人猿的概念,它并不等同于拥有道德、政治主体人格的人,不等同于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集团整体。"人类"并不是能够在历史开端、

① 上原弘江:《父亲的轨迹》,《集》(全 28 卷)卷头插页。

在世界史的开端规定好的范畴,它要在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简单地说,所有成员能够有机结合的、作为包括了全体社会集团的人类,至今尚未实际存在。“今天的人们,不能不担负起不久的将来创造出那样有机结合的人类的课题,而现在就认为自有历史以来就有了人类,或者说今天人类业已存在,我认为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混乱。”①

追问人类是否存在是个激进的观点,上原以这样的方式涵盖了一个庞大的学理问题群:上原完整地通读了兰克晚年的巨著《世界史》,并延伸阅读了弗利茨·科隆发起、由西德 140 位学者合作完成的十卷本《世界的历史》;上原也下功夫钻研了马克思的世界史理念,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了苏联科学院集体写作的十卷本《世界史》。他在 1964 年做过两次长篇报告,题目分别为《兰克与〈世界的历史〉》《马克思与苏联科学院〈世界史〉》。从题目即可看出,上原试图在思想传承的脉络中把握西德与苏联各自的《世界史》。这是一个耗时的工作,它的前提是避免望文生义或者断章取义,需要“沉下心来阅读”。②

笔者对兰克的《世界史》与其他两部合作著述的世界史均不了解,无法正面讨论。但通过上原的评论,可以了解他区别人类史和世界史的用意。简单地说,在兰克和马克思那里,人类史与世界史必须加以区别,而在传承了兰克史学的德国《世界的历史》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科学院《世界史》里,人类史与世界史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在德国的大型论文集《世界的历史》里,两者被生物学和历史学的不同学科作者并列搁置,并未处理其相互关系;在苏联科学院的《世界史》里,两者被混为一谈。在含混不清这一点上,上原断言这两部具体观念截然不同的大型系列著作是一致的。

笔者在此感兴趣的,并不是上原对这两部《世界史》作者群的人类史与世界史理解进行的质疑,而是他对兰克与马克思如何区分人类史和世界史的分析。他援引晚年兰克的论述指出:兰克认可考古学和语言学对于史前时代的研究,但是却同时认为它们只是给历史知识的百科全书增加了装饰,对于历史认识的形成没有多少帮助。上原分析道:兰克只重视文字记录的文献,他不承认其他学科对人类起源的考察有助于形成历史认识。从后来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等等不断对史学发生影响的情况看,兰克此说确实有些陈腐,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考察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语言学(也包括后来的人类学、民族学)是否历史学化了,它们是否在历史领域里工作。③

这里涉及什么是历史化或者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上原对兰克史学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兰克坚持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代是人类能力无法抵达的领域,只有上帝才能解释;与其说这是兰克的神学取向,不如说是他为历史学划定的边界。兰克认为通过确定起源而理解人类历史的各种事物并不是历史学的工作,这也意味着他并不依靠因果关系解释历史;历史学固有的任务是研究有据可查的时代里形成的文化传承,它包括宗教与政治生活,法与人类社会的诸种基础。兰克反对不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就无法研究世界史的通行看法,指出世界史不是各个民族史的集成,而是诸事物之间的关联。不过,兰克并未因此平等地处理世界各民族的多元性问题,而是仅仅把西欧的历史作为世界史的代表。上原通过兰克对世界史学的界定,进一步指出,世界史不能平板化地堆积不同民族的历史,把亚洲非洲的历史和欧洲史各不相干地并列起来,也无法克服兰克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在生产新的认识论时,兰

---

① 上原专禄:《世界史的看法》,《集》卷 25,第 502—503 页。

② 语见上原专禄:《兰克与〈世界的历史〉》,《集》卷 25,第 335 页。在同一篇长文讨论兰克史学发展特征的部分,他指出,兰克之后的欧洲史学界的通行做法是根据兰克早年的几篇史学理论论著确定他的史学观念,认定他的看法终身未变;但是几乎没有人从他晚年的巨著《世界史》中慎重地提取他的历史观,因而不免与兰克史学发展的复杂性擦肩而过。例如迈纳克等人对兰克早期强调历史事件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一观点绝对化,发展历史主义的论述,但是并不顾及晚年的兰克提示了更立体的普遍史思路。上原略带讥讽地说:读早年的几篇理论著作短时间内即可完成,但是读晚年的八、九卷本大著,就算是德国人也还是觉得麻烦,所以他们只是根据前者就下了定论,然后根据这些定论进行不靠谱的推理(第 361—362 页)。

③ 上原专禄:《兰克与〈世界的历史〉》,《集》卷 25,第 375—376 页。

克对历史起源和历史学任务的思考反倒具有参考价值。

上原对马克思的解读主要集中于他的世界史认识。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从事的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理论著述,但上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认识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原的着眼点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马克思在其中表述的“历史的学问是唯一的学问”的看法持续了一生;马克思并不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强调历史的法则性,而是同时强调从历史中抽象出的理论只是引导人们客观地认识历史现实的线索,脱离了历史的现实,理论没有价值。而历史现实,正是各个历史时期具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与行动。马克思的这一视点,为《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判导言》等重要著作提供了基础,也是理解马克思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差异的重要根据。

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世界史”并不是某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而是资本的全球化结果。换言之,人类的历史发展到某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到整个世界,于是历史自我变革,打破了原来各地的封闭状态,才形成了世界史。①

上原在马克思那里遇到了一个难题。在马克思的时代里,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阶级的范畴是理解资本把历史转向世界史的关键。但是在上原所处的时代里,亚非拉独立运动把民族问题推上了前台,民族问题无法简单地还原为阶级问题。上原承认阶级与民族的纠葛关系无法直观地讨论,在他建构世界史的时候,他坚持同时使用这一对概念作为主轴。

四、作为实践课题的世界史

上原专禄对马克思世界史观念的解读是:“马克思在使用世界史这个词汇时,在其深处同时考虑的是作为实践问题的革命课题。”②

上原的世界史建构也同样是一场作为实践问题的革命。从早年深入欧洲文化的时候开始,上原就积累着作为亚洲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兰克史学的“对抗”史观③,兰克史学把欧洲史作为世界史代表的观念,都让上原意识到,仅仅依靠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把亚非拉历史平板化地添加到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图谱中去,无助于建立新的世界史论述。自《日本国民的世界史》问世之后,上原开始建构他“一个人的世界史”。他曾经尖锐地批评当时日本盛行的“传媒世界史”,即以商业为目标的世界史写作,近乎洁癖地拒绝了相关的出版邀请。在上原看来,商业写作不仅无助于形成日本国民的世界史感觉,而且也无法在学理上面对兰克和马克思曾经提出的那些尖锐问题。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作为革命实践问题加以思考的世界史,在商业性写作对于欧洲中心论的简单盲从或者廉价批判中不可能产生。

据上原弘江回忆,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机的上原,专门外出观看会议的实况报道,他回家后复述亚非各国首脑进入会场时的从容态度时,情不自禁地为民族独立带给亚非世界的尊严而热泪盈眶。当时日本主流社会对万隆会议十分隔膜,这个细节生动地勾勒出上原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张力;1956 年,当日本的进步舆论集中关注斯大林批判和波兰、匈牙利事件时,上原却倾情于由铁托、萨达特、尼赫鲁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并对这个具有“马赛克”性质的松散国际联盟给以持续关注。④ 同属日本进步思想界,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左派与上原之间,围绕着“第三世界情怀”显示了微妙的错位。

---

① 上原专禄:《马克思与苏联科学院〈世界史〉》,《集》卷 25,第 443—444 页。

② 上原专禄:《马克思与苏联科学院〈世界史〉》,《集》卷 25,第 444 页。

③ 在兰克史学中,历史发展的动力被归结为国民以占有和统治为中心的相互对抗,“在这种抗争中,特殊的事物被一般性事物所改变,同时也构成对一般性事物张扬自我的反作用。”上原专禄:《兰克与〈世界的历史〉》,《集》卷 25,第 384 页。

④ 参见笔者:《多极化时代的大国责任:不结盟运动的历史启示》,《文化纵横》2021 年第 5 期,第 64—72 页。

1964 年,上原在历史学教师的学会上做了长篇讲演,如此分析国民学习历史的必要性:国民的生活与工作,由历史所制约,也由历史赋予其动机,作为历史而存在和具有意义,从而不断创造历史。日本国民面临的紧迫问题,是生存问题、生活问题、自由与平等问题、进步与繁荣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则是独立问题。因此,讨论人类起源的人类史,作为知识虽有价值,但是它把人们引向了“未开化还是文明”的问题,距离国民的上述切肤要求太远,而它的现代版本是“后发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种单纯的、单线的历史把握,是需要警惕的历史认识方式。上原指出:仅仅用因果关系不能有效解释历史,因果关系常常受制于其他关系,故既定的原因未必产生既定的结果,还需要认识对其发生影响的机能关系,以及事物的结果对社会具有的意义关系。世界史在这种种关系中运动,日本国民的历史感觉也需要在这些关系中形成。上原强调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并不只是阐明因果关系,它包含了把握机能关系与意义关系的方法意识。①

在这个时期里,陆续辞去各种职务的上原专禄并没有放弃对公众的讲演。他把专深的历史学甚至历史理论课题讲给史学家之外的公众,显示了他希望推动“日本国民的世界史”认识的良苦用心。在上原看来,大学教授未必比业余人士更能理解世界史,特别在以发达国家自居的日本,大学里仍然顽固地保留着过去时代的“西洋意识”②,以传媒化的世界史谋生的大学教授们轻松地沿袭乃至模仿欧洲世界史的观点,或者对其稍作修改,没人愿意下苦功独立思考,追究世界史的整体认识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授诸公甚至缺乏国民大众那种对世界史的时事性关心。③

然而,世界史既不是个别问题、个别事件的总和,也不是国别研究的总和,更何况世界史不能依靠直观的常识研究。即使是面对市民讲演,上原也反复强调,世界史有自己的操作方法。例如,他提出将世界划分为十三个“地域世界”的假说,每个地域世界都由若干国家、社会组成,拥有相互媒介的内在机制,整个世界就由这种地域世界的相互关系结构而成④。这种地域世界“水晶群”性格的结构,打破了兰克设想的以欧洲为代表的世界史构图,也打破了汤因比设计的挑战—回应模式;而上原对民族独立的关注,则在这个世界史图谱中注入了非西方世界的动能。

上原还提出另一个假说,即历史空间的最小单位是个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并不比国家乃至世界更具有实体性。其实他这个说法换个角度更好理解:国家乃至世界并不比具体的个人更空泛。“我们说一个人活着,其实就意味着他现实地支配着一定的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⑤上原这个思路与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致的。他曾经写道:“马克思作为问题讨论的人,绝非一般性的人,而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拥有对生活的要求——他把那样的人作为问题。”⑥在同样的意义上,上原把个人作为历史空间的最小单位时,也不是一般性地讨论抽象概念。他同时界定说,一旦人死亡,就不再支配历史空间和时间了。这种对生死的界定,拒绝了把人观念性地视为抽象个体的想象,使世界史得以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使世界史与现实人生直接相关。

上原在 1968 年回顾自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意针对京都学派“世界史哲学”而作的“历史性省察”时写道:“在这一省察中,‘世界’与‘日本’与‘自我’这三者不能不同时成为省察的对象。……这三者最多不过是在不安定的动态关系中相互起到媒介作用,任何一方都拒绝被其他二者所吸收。”⑦显然,这里所说的“自我”,正是历史时空的最小单位。在这个意义上,上原认为现代是世界史中特别的阶段,

---

① 上原专禄:《历史研究的思想与实践》,《集》卷 25,第 274—280 页。

② 上原专禄:《现代的“东洋”与“西洋”》,《集》卷 25,第 525—526 页。

③ 上原专禄:《世界史的看法》,《世界史的起点》,《集》卷 25,第 494—495、559 页。

④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十三个地域的划分根据等,请参照笔者《世界史中的亚洲》,在此从略。

⑤ 上原专禄:《世界史的起点》,《集》卷 25,第 547 页。

⑥ 上原专禄:《马克思与苏联科学院〈世界史〉》,《集》卷 25,第 446—447 页。

⑦ 上原专禄:《世界史的起点》,《集》卷 25,第 560—561 页。

因为它与现实生活着的人密切相关;生活现实的历史化认识,正是人作为历史空间最小单位形成主体性的契机。而“国家”,恰恰是自我面向世界时必经的媒介。战争历史让上原深感作为日本国民的责任,他为之奋斗的世界史,并不是天马行空的理论游戏,而是紧迫的实践课题。

上原对人类史与世界史的区分,在此进一步延伸为警惕认识论上的“世界史主义”与实践上的“世界主义”。这种一步跨过最棘手的自我与国家、空泛地讨论人类与世界的知识形态,以及由此而生的隔岸观火的实践立场,是上原抵制了一生的认识论陷阱。上原改变了我们对于“考证”的习惯性理解,他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史料批判”的灵魂在于为史料在诸种历史关系中“定位”,当直面个体与国家的“史料批判”方法转化为世界史认识论的时候,它迸发出何等强大的思想能量!

The Ideological Range of th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Uehara Senroku and His World History

Sun G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Uehara Senroku (上原专禄) was an academic giant who faded out of public view in Japan long ago. In his life, he experienced the Eras of Meiji (明治), Taisho (大正), and Showa (昭和), and established a deep connection with the basic topics of his times by keeping a distance amidst the ups and downs of history. Through his own efforts, he constantly broke the imagin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academia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s, thought and reality, and established the cognitive for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life and history. In his early days, Uehara Senroku received such training on th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edition in Vienna, which laid a specific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research on world history with profound ideological tension. Following the train of thought on th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an not only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Uehara's world history, but also prompt us to reflect on the neglected blind spots in the general discourse of world history.

Key words: Uehara Senroku (上原专禄);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orld history; modern history

(责任编辑　管　琴)